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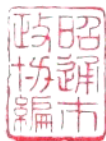
2505

昭通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90



封面说明：

双鱼洗圆形图，系三十年代昭通出土的东汉双鱼洗临摹图。其文为：“建初八年朱提造作”（建初八年为公元83年）。此系昭通考古学家张希鲁先生访获珍藏。现藏昭通行署文化局。

横纹系汉砖花纹。

目 录

八六反思	蒲汉英 (1)
忆昭通中学旅省同学中部份	
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李长猛 (17)
马金碧烈士传略	贺以明 (35)
成均老人著书要目	姜昆武 (40)
昭通方言疏证自序	姜亮夫 (55)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昭通地区	
政区设置述略	陈孝宁 (57)
朱提银铜考	陈序德 (73)
台儿庄抗战回忆	安思淳 (104)
台儿庄战地人民的缅怀徐一鸣先生的三封来信	(150)
评电影《血战台儿庄》	徐一鸣 (153)
记抗战初期抗日滇军在孝感	晋 望 (157)
回顾长春起义	陇 耀 (159)
王仁品事略	凌 空 (173)
名中医张复初逸事二则	贺以明 (176)
中国民主同盟昭通市总支筹委会简史	(181)
民革昭通市支部简介	(184)
中国民主建国会昭通市支部简介	(187)
黄埔同学会昭通地区联络组简介	(191)
中国人民政协云南省昭通市第三届委员会名单	(196)

补白十二则：

游龙洞.....	(34)
姜亮夫先生治学之道.....	(39)
风入松.....	(54)
梦咏李白.....	(72)
过项王墓.....	(103)
戊戌春自滇赴燕途中有感.....	(152)
圆宝山.....	(158)
柳闸含烟.....	(175)
寄怀同志.....	(180)
鹧鸪天.....	(183)
过巫山望十二峰.....	(186)
满庭芳.....	(195)

八 六 反 思

浦汉英

1959年接到至友张希鲁兄函云：“正怀念间，忽蒙赐书及五十纪怀长诗，欣慰之至。……回忆三十年前，兄与许多进步同志，为争光明而奋斗。自解放以来，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操纵了。不但国内生产建设大大发展，即世界的永久和平亦有希望。兄与弟多年的渴慕得到实现，真可共庆。细读赐诗，异常翔实。经过多次的学习运动，想兄必另有一篇自传，容后有暇，尚望示弟。”（函见《西楼文选》，五十纪怀见《业余存稿》）

今年（1989年）2月22日，忽忽过了八十六个年头。经过清王朝8年，民国时期3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在这样漫长的历程中，千头万绪，夕阳虽好，然而已属黄昏，十九都已忘怀。所能牢牢记住的是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离开了人民，我能活到今天吗？而我对人民又做了些什么？我对待得住人民吗？因为俚句云：

春光满院庆婆娑， 三万一千余日过。
事事反思思不尽， 人人为我我如何？

第一句用了一个典故。儿时阿母希望我长命领我去参拜一株

古槐，并以树字名我。《枯树赋》云：“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此处反其意而用之，故用了一个庆字。第二句是八十六年的日数。

最近接到昭通市政协贺以明同志来信，要我写写自传性史料，以供昭通市志办的需要。我复信说：“我这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值不值得在家乡志书上立传，要认真考虑？但既然是昭通地区的人，是否有对不住祖国和家乡人民的地方，也应该实事求是的作个交代”。

以上就是写这份资料的序言。

浦光宗（字汉英化名江之平）

自传性史料

一、历史轮廓（解放前）

1. 1903年2月下旬出生于云南昭通，现（1989年）86岁。父锡三，因家贫不能上学，自幼从父兄租地耕种，后当小商贩，家庭生活小康。我和兄长灿章，才得上学识字。母陆氏，鲁甸农村女子。

1919年，进入昭通省立第二中学第二班。1923年，进入昆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1928年冬，在东陆大学土木系毕业。

2, 1919年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成立了全国学生爱国联合会。昆明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联合会。在昭通省立二中内也随即成立了学生爱国联合分会，其负责人为二班同学刘千骥

(字寿安)，同学王启瑞、杨恩浓、姜穆清和我也参加了分会的组织。1919年7月发生了昭通驻军旅长蒋光亮部下殴打二中学生的事件，分会发动同学协助校长姜思敏（勉之）、教师刘盛埴（陶庵）、戴澍椿（仁甫）与之对抗，并赴昆明上告，得到省学爱会及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打赢官事，1920年春蒋军被调走。这是昭通最早的一次学运。戴仁甫先生是一位比较进步的教师，介绍学生阅读当时风行全国的刊物《新青年》、《新潮》等，我曾经把“唯物史观”那段翻译文字读了背得，但不大懂。后来有些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全国学联派同学到各省宣传“沪案”，通过学联发动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起来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昆明在李国柱、吴澄两同志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青年努力会”策动之下，由学联发动全市学生及爱国人士，开展支援“沪案”运动。东陆大学学生，在至公堂开会，成立东陆大学学生会，并选举代表杨雪芳和我参加学联。我曾派到金碧路金马坊附近，进行宣传活动。云南随即建立了以李国柱为首的共青团组织。次年（1926年）夏李国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云南人在本地入党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3. 李国柱虽然入了党，并准备建立云南党组织，但随即遭唐继尧省府的通缉，经巧家、昭通、盐津这一条路，离开云南，到上海后，由党中央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共两广区委陈延年随即代表中共华南局指派李鑫（号木子）、黄丽生、周霄来云南建党，及开展农运、工运、倒唐等工作。李鑫于1926年9月到昆后，随即联系上共青团及“青年努力会”负责人吴澄（李国柱走后交由她负责）并介绍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是云南人第一个女党员。他们于当年11月在昆明牛角坡建立了云南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云南特委会”，李鑫任书记，李国柱（已离开云南）、吴澄为委员，下分两个支部，一个设在周霄家里，李鑫兼

支书，一个设在黄丽生家里，吴澄兼支书。（见云南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四辑黄丽生所写《云南地下党初期活动的片断回忆》）。特委建立后随即开展工作，利用地方军阀内部矛盾，策初倒唐，于1927年2月6日，发生了“二·六”政变。王德三随即奉派来昆明，将云南地下党组织扩大建立为全省性组织：“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当时王启瑞（辑辉）在云南省高级师范科读书，于3月间被吸收入党，他随即奉派来对我进行宣传教育，于4月下旬，通知我到省教育会接头，赴祚传接见了，并告知已批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知道赵是省委组织部长）东陆大学从此有了共产党员。（参看云南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十二辑我所写《中共云南地下党在东陆大学学生中开展工作情况》）中共云大组织史资料征集编写小组曾来访问并写了：《人间重晚晴——访问我校第一位党员浦光宗同志》一文。

4. 我参加中共后随即和王启瑞组织了“昭通旅省学会”。（用学会而不用学生会的名称是为了扩大范围）第一次会是在翠湖内云南省图书馆张希鲁宿舍（即西楼）内召开的。王启瑞随即被组织派到外县工作，学会即由我负责。学会会址在翠湖南路小井巷昭通旅省同乡会内，当时在昆明读书的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也有几个在昆工作的青年人参加在内。现我处还保存一张在会馆内的合照，从左起后排是姜○清、○○○、张金衡（刘华昭）、张希鲁、邓象富（邓涟，聂耳的入团介绍人）；中排是王正昌（飞鹏）、胡光和、○○○、浦光宗、○○○、马世宽、○○○、吕萃文（耘艺）、邹锡宾；前排是龙云翔、陈惠芳、龙美莹、龙泽文。这些人当中后来有六个参加过中共党团组织（其中有二人成了叛徒，有三人脱了组织未得恢复）。王启瑞因已离昆，未参加合照。（王在地下时期坐过敌人的两次监，解放后又坐过自己的监，1986年秋恢复党籍。）昭通旅省学会出过几期

《会刊》，会员们写过一些鼓吹革命的文章。我自己曾写过一篇《土豪》的剧本反映昭通一位大名鼎鼎的绅土地主的情况。昭通旅省学会后改名为“新昭通努力团”，扩大范围，以便吸收不在昆明的昭通学生和进步青年参加活动。会员中的胡光和在1928年春曾由党组织派他到昭通建党，他介绍查宗藩参加了党，查又介绍费炳参加了党。很可叹，胡、查二人后来却成了大叛徒。幸而费炳坚持下来，并成为云南在1935年9月重新建党的功臣。“昭通旅省学会”和“新昭通努力团”，对昭通的学运和党的建立是有一定影响的。

5. 我参加党后，随即在赵琴仙领导下参加学运。从1928年初起，省特委指定我负责云南学运和赤色济难会的工作。当年（1928年）5月中央给云南省特委一封信，对云南党的工作给予批评，并“要求云南党召开一次扩大会，选举产生临时省委，不同意成立正式省委”。（见云南省委党史征办1986年2月《早期组织活动大事记》征求意见稿29页）云南省特委随即于7月在蒙自“查尼皮”（芷村车站东面约30华里）召开了省特委扩大会议，我因负责学运被指定出席，是和黄凯（黄洛峰）一齐下去的。省特委书记王德三当时已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故查尼皮会议系由代理省委书记的吴澄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德三为首的中共云南省临委成员，我亦是当选人之一。（详见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四辑我所写《忆吴澄、李国柱同志》一文）会后我仍分工负责云南学运及赤色济难会工作。

插曲：此时（1989年5月17日）写到这点。适值中苏最高级会晤在北京举行。部份大学生因反对官倒等腐败现象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请愿，很多市民及各界部份人士游行声援，部份学生晕倒，各医院进行抢救。人民日报曾在4月26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认为很正确，曾在我负责的云南公路史编写组内学习讨论。

今早（18日）听了“新闻及报纸摘要”，学生绝食已进入第六天，为了避免雷雨，绝食学生被移到红十字会开来的百余辆大客车上。我过去做过学运，但那时形势不同，深感从“五·四”以来历次重要学运对革命事业所起的极大推动作用，而当前必须维护安定团结，对幕后极少数人，不能退让。我相信我党成熟的中央和伟大的祖国各族人民。事态正在发展。但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解决问题，我思想上是乐观的。

今早（20日6时）我听了广播，中央在19日召开了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同志代表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杨尚昆主席也讲了话。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坚决拥护。我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继续写这份沧海一粟的材料。

6. 1928年8月下旬，李国柱回到昆明，他当时是省临委委员，分工任团省委书记，兼滇中东地区党的区委书记，吴澄参加负责。李回来后，随即在昆明龙翔街团省委机关秘密住地（今龙翔街66号）召开了滇中东地区党的工作会议，参加者有吴澄、吴少默、朱晓光（此人后被捕叛变）和我共5人。（都是在上月查尼皮会议中当选的省临委委员。）讨论了滇中东地区的各项工作。会议在夜间秘密举行，共举行了三夜。（详见云南历史研究所《云南现代史研究资料》第四辑我所写《忆吴澄和李国柱两同志》一文。）此后我分工在团省委工作，仍负责学运及济难会，由李国柱代表省临委单线联系我。我被指派出席指导省一中及女中两个团支部。

1928年10月，龙云省府下令拍卖省师校址，并令当时的教育厅将省一师迁往郊区。在省临委指示下，团省委组成一个临时党小组，由我任组长，雷必兴（溅波）、李世宗任组员，负责这一斗争。李国柱和我联系进行指导，不在党小组内出面。我和雷不在省师出面。由李世宗以省一师学生会主席身份在省师出面，开展工作。小组经过几次研究，拟定斗争的具体办法，在省师举行一

次文艺晚会，演出话剧（以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为底本的话剧，由聂守信（即聂耳）主演剧中的女主角。）邀请全市大、中学生、教职员前来参加，借以发动斗争。演出非常精采，当观众兴趣正浓之际（我第三次到后台催促时），忽然停了下来，由省一师学生会主席李世宗宣布云南省府为了破坏学生运动，摧残教育、要拍卖省一师校址，把省一师赶出城外，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第二天，在省一师校前广场上，聚集了千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龙云当时虽取得了云南省政权，但政敌胡、张等尚在，恐事态扩大，对他不利，被迫收回了成命，斗争取得了胜利。表现积极的学生，被吸收入团，壮大了革命队伍，并为党在迤南等地区的需要，准备了力量。

1928年12月下旬，李国柱代表省临委指派我到昭通对费炳及所领导的农民小组了解情况及传达省临委《加强农村工作的决议》。对昭通学运也作一些了解。我步行十一日到达昭通，已是次年的一月上旬，和费炳接上头后，于二月初离昭返昆那天早上在南郊望海楼对费及所召集的农民小组约六七人进行了传达，即赴昆明（同行的有王启瑞、张守玉、马冰清等。）返昆后我对李国柱报告了昭通组织农民及学运情况。（根据后来由中央档案查到的1929年4月云南省临委给中央的报告有：“去年12月上届临委派特派员一人去工作，不久回省。”又：“昭支尚有工作能力，党员三人。”又6月8日报告：“昭通特支原系当地学生支部，党员3人，工作能力，是云南模范，领导数百挑水工人，要求加价斗争，领导附近农民，反豪绅斗争。”“上届临委”；指1928年7月在查尼皮会议选举产生的临时省委。“12月指派特派员一人去昭通工作，不久回省，”指的就是派我那件事。

7. 1929年3月，经李国柱转报省临委请示，同意我随东陆大学毕业同学外出参观，离开了云南。后来因生活问题，到萧常铁路（即浙江到江西铁路首段）工作，任练习工程师。1930年8

月，我在义乌县铁路工段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送杭州狱。（因在义乌县认识一个青年人黄昌梧，黄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儿子，在上海读书加入了党。交往间互相通信，说了一些互相勉励的话，我给他的信有“世界上的光明天天在加强，努力吧”这句话。国民党特务到义乌县抓人时他被捕了，并拿去我给他的这一页信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我因此被捕。）但因我的组织关系外出后未暴露，故在敌狱十四个月后，经铁路局等有关方面援救，于1931年9月下旬（“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得以释放出狱。返回云南，云南地下党省委已于1930年底遭到破坏，接不上关系。（1978年10月交通局党组交党发203号文及1985年省委组织部云组复57号文先后承认我在杭州敌狱“无问题”和“表现是好的”。）

8. 1931年冬我回昭通，次年春老父病故。曾在昭中高师班教数学。1932年冬至1933年冬在昆明道路工程学校任教及负责教务。1934年春至1935年春在云大工学院及工业学校任教。1935年秋至1940年春任宣昭公路工程分处主任，修通宣威经威宁到昭通的公路301.3公里，从此，昭通与昆明开始通了汽车。

从1939年春至1940年春，我和我的战友爱侣宋方同志，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在威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和宁其坤（现名汉戈，毕节人）等几个进步青年人结识，共同（宋和宁先后在小学任教）组织歌咏队、读书会、推销《南方》，曾组织演出以流亡三部曲为底本的歌剧（宋方主演），并组织学生和威宁各界人士举行了一次反日汪火炬大游行。（关于这件事，数年前威宁党史办曾派人到我处和济南宁汉戈处访问了解。）我们于1940年夏离开威宁后，宁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后逃狱出走，辗转赴延安，建国后宁被派到山东济南负责教育工作。

此后6年（1940年夏至1946年夏）我先后任滇越公路工程处正工程师，云南矿业公司土木工程处长，南盘江水利工程处长，蒙河公路工程处长，云南省公路局总工程师。在矿业公司继续修

建完成了开远南桥水电厂的工程。吕耘艺曾由我介绍去任材料股长。为了陆良南盘江水利工程，当时的省企业局曾叫我到玉溪去聘请熊从周老人（他在1930年陆良暴动时与地下党有联系）到他过去深得民心的陆良县再度出任县长，以便动员广大农民修建南盘江水利工程。我离开陆良以后，熊老先生竟遭当地坏人，借吃三乌汤的机会，毒死了他。在陆良时，我和宋方掩护了一些地下党同志，在曲靖、陆良为党工作。

9. 1946年秋，卢汉省府委我任省公路局长，当时地下党省委派一位省委委员联系我。我后来根据党的意图，先后安插了几个党员在一些附属单位负责，暗暗为党工作。（玉溪管理站长刘碧华，解放时任玉溪专区副专员。元平管理站长毕江，后由党调迤西任县长及县委书记，解放后任大理自治州委统战部长。刘格非、江玉芝在监所任所长及任职，为党做情报工作，刘在1945年曾联系过我，1947年7月后我又联系他。聂映仙在工程课任职。还有一民青成员段维嘉在东站任职。）他们的安全由我负责。1949年秋，路局一些青年职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个别参加了党（刘宝华，解放后任峨山县委书记，后任专署农水处长及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安全也要我负责。这期间，叛徒及敌特向警备总部、国民党省党部、卢汉省府密告我，罪名是“共特”。我感到处境太危险，恐难完成任务，曾要求下乡工作，但未蒙批准。答复说：“你仍须在着，越爬得高越好，最好弄得一个专区。”有一天，卢汉通知我去谈话。那天去见他的人很多，我是最后一个。卢汉说：“你在搞些什么？有人告你。”情况很严重，但我镇静地对他说：“主席，我是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公路、水电、水利等工程上为主席和家乡效过劳，行政工作我不行，可否让我辞去行政职务，专做技术工作？”卢汉想了一下说：“不要紧，你在着好了。”歇了一下，他又说：“是不是把副局长调开？”（因为此人也是密告我者之一。）我说：“没有关系嘛，请主

席斟酌。”谈话到此结束，不久以后，那个副局长被调去任伪县长。我和卢虽系同乡，互相认识，但很少往来。当时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及他和蒋介石之间矛盾加深的情况，以及地下党对他的策动工作，迫使他对我被密告问题，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又云南的公路管理机构，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南京派来的第四区公路局，管理国道。一个是省公路局，管理省道。若省公路局再被南京方面插手进来，对他大大不利，这也是他对我采取保护态度的原因之一。叛徒查宗藩、彭祖祐、陈家铨还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内任职，这些叛徒对我在二十年代那段情况，他们是知道的。然而我忽然在卢汉省府内任了这样一个要职，我是否也成了叛徒，他们搞不清楚。但不得卢汉点头，他们是不敢对我下手的。据刘格非告知：查宗藩曾在一次特务会议上说：“对浦光宗等人，究应作何处理？”又同学刘伯庸告知，有一个姓薛的伪警察，曾向他探问我的情形。当时云南站的特务负责人沈醉也已布置人对我跟踪监视。解放初，1951年11月镇压特务时，云南日报11月21日第四版载：“军统特务傅汝德，常向特务头子沈醉密报浦光宗等进步言行。”又1953年政训大队钟辉（党校同学）曾对我说，某伪警察坦白他在解放前奉命监视我的情形。特务叛徒虽然由于上述情况而未能对我下手，但我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不得不以非常隐蔽和灰色的方式而进行党交给的工作。

在此期间，会昭公路于1949年1月通车，我于1月16日试车到达昭通。由昆明经会泽至昭通共460.7公里。而由昆明经威宁一线则为560公里。路线约短100公里，虽标准较低，但昭通与昆明之间，又多了一条公路。

10. 省公路局门口，悬挂着一块国民党特别党部的牌子，我到该局后，已不存在这个组织，但我不能把它取下来，若取下来就暴露了我。后来审查我的政治历史时，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审查结果肯定了我在地下时期，未参加过反动党团。（1978年10月

交通局党组交党发203号文及1985年省委组织部云组复57号文。)

11. 1949年7月,李剑秋离开昆明时,把我的组织关系转交吴邦彦联系。吴是昆明市委统战委员会负责人。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成立了一个统战党小组,吴任组长,徐君直、林毓杉和我参加为组员,不久以后我又参加市统委。这个党小组是策动卢汉起义的渠道之一。吴邦彦与吴少默(民政厅主任秘书,曾是云南早期地下党省委委员,未恢复组织关系)联系,吴少默与杨文清(民政厅长)联系,杨文清向卢汉转达党的意见。“九·九”整肃事件前,蒋介石要卢汉去重庆,地下党争取他不去,他被迫去了。地下党迅速疏散党员下乡。卢汉回来,根据特务开的名单,捕了四百多人,大多数是社会进步人士(省参议会杨青田、马曜、张守玉等多人及各界人士)。特务头子们要卢汉杀一批人,但卢汉设法应付,后借李宗仁来昆的机会,提出请求,得到同意,把被抓的人交卢汉处理,后来全部陆续释放。这件事在统战党小组内事先作过传达。卢汉起义前,因解放军相距尚远,而蒋军嫡系第26军及第8军,力量相当强,为了避免大的破坏,地下党曾希望他将时间适当推迟。后来迫于形势,卢汉借张群来昆之便在12月9日晚,抓了李弥、余程万等人,宣布起义。卢汉准备起义这件事在统战党小组内事先也作过传达。

12. 在卢汉起义之前,宋方向党组织请准,对宪兵13团进行策动起义工作,我配合着她进行这一工作。在此期间,组织交给我以政治联系方式,联系一批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黄丽生、周霄、王启瑞、卫立三、吴诚格、杨辉元、张乃猷、向正清、倪之桢等,及组织土木工作者联合会、医务工作者联会、机电工作者联合会等科技团体,团结科技人员,以便为党做有关科技工作及保护财产档案工作。

卢汉起义后,蒋军第26军、第8军反扑昆明,解放军兼程入

滇。敌军败退时破坏了公路及铁路桥梁，我们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力量，进行抢修，准备迎军。

二、历史轮廓（建国后）

13，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部于1950年2月20日举行了入城式，进驻昆明。

1950年5月16日，云南军区（由四兵团组成）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亲自对我交代了“碧河公路”抢修任务。23日发给我一个委任令：“为国防需要奉中央命令限期迅速修通碧（碧色寨）河（河口）公路，为此特组成碧河公路工程委员会……下设工程处，以浦光宗兼处长……”

碧河公路系用滇越铁路基修为单车道，加让车道，全长178.8公里，要求短期抢修通，以支援当时的越南，和加强国防。（另一方案由碧色寨经蒙自城、新安所、卡房到河口180余公里是正式公路线，因工程大五倍，迅速抢修通有困难，未被采用。）因解放不久，人民币不能通行，故概算为1168万市斤大米（每市斤以1400元计，合人民币163.52亿元）。实际用去粮食及半开折合大米共节约454.25万市斤（折合人民币63.6亿元）。员工由军区、交通厅、铁路局昆明分局、卫生处借调共308人。工人计民工一万人、工兵团二千人、起义的铁道队八百人、工兵营三百人、石木铁工及运输工一千二百人、失业工人七百人，合计一万五千余人。施工期间最大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上（蒙自专区的粮食被匪霸烧毁数十万斤）延误了工期约45天。又九月末山面的大坍塌出乎意外，又延误了约15天。自六月下旬陆续开工至十一月初竣工共计工期140日。施工期间路线两侧山岭间随时听到匪霸的枪声，解放军工兵，肩负了保卫及施工的双重任务。因系严重瘴疠地区，特别加强医药设备，将因病死亡人数，减至最低限度。经

向省委请准设立党总支，由工兵团政委杨荣新任总支书，我任支委兼工程处支书，工兵团任务完成离开后，由我继任总支书。

碧河公路在1950年11月2日通车时，我方一辆军用吉普开到河口时，对岸越南属老街的法国武装立即撤走，老街随即解放。此路原要求使用两年，但使用至1956年6月才由公路管理局移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8501部队修复为铁路。

14. 1950年10月30日碧河公路竣工时，我得到通知到昆明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就职典礼，从此时起，我被调任省交通厅副厅长。稍后参加了省人民政府党组（党组书记是副主席周保中）。同时任省财委委员和财委党组成员（书记是副主任吴作民），并参加省科协筹委及省总工会筹委。

1952年9月被派到省委党校学习。

1953年4月被调省公路修建指挥部（司令员系省长郭影秋）工程处任副处长（处长是交通厅厅长杨德讲）兼总工程师，主要负责南涧到勐定的南大公路和个旧到金平的个金公路，并指导昆明到打洛的昆洛公路（该路由西南交通部第三施工局负责）。

1955年春调任交通厅总工程师。

15. 1957年5月参加整党学习，后转变为反右斗争。当年10月交通厅作整党学习总结，认为我在党内的发言虽有错误，但只在党内说，没有在党外说，而且是针对个别人，不是针对组织，故认为不是问题。后来个别人将我发言的记录，秘密篡改，密报当时的谢富治省委。1958年5月初旬，忽然召开大会，通知我去参加，宣布省委批示，同意将我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受三降处分，仍留原机关工作。一直到党十一大三中全会后，1979年6月才得到改正，恢复党籍及级别、职称，〔省交通局党组交党发（1979）45号文及省委工交口工交党字（79）39号文代省委批〕并任命我为交通厅总工程师室顾问。这样，我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被剥夺二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到基层工作，向群众